

# 201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方 铭<sup>1</sup> 舒 鹏<sup>2</sup>

(1. 北京语言大学 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3;

2.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屈原与楚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研究重点之一,其相关研究在2016年持续推进,著作迭出,成果斐然。本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的论域主要有屈原的身世经历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翻译研究等。

**关键词:**屈原;楚辞;楚辞学史;宋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4-0034-14

2016年,国内外出版屈原和楚辞研究专著及普及读物达四十余部,各类学术期刊、报纸刊行相关研究论文四百余篇,其中包括二十余篇硕、博论文。此外,与楚辞相关的研究会议、纪念推广活动也纷纷举办,为屈原、楚辞研究的推进及其在当代影响力的提高提供了动力。现将2016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情况总结如下。

## 一、屈原的身世经历研究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的诗魂、国魂、民族魂,其品质精神光耀千古。在学术界,屈原其人生平事迹、思想精神也是研究一大重点。张强<sup>[1]</sup>撰文认为屈原爱国主义情感体现在眷恋故土、关心人民、忠于君王、关心国事、热爱文化等几个方面。而其爱国主义与楚人的忠君爱国传统是紧密相关的。潘冬<sup>[2]</sup>提出屈原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还是一位拥有相对完整教育思想体系的教育家。陈亮<sup>[3]</sup>对屈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始末进行了回顾。钱耐香<sup>[4]</sup>则以一“奇”对屈原的才华与

人格进行概括论述。此外,清后期以来,学界长期存在一股“屈原否定论”观点,这不仅是对屈原的否定,也是对历史的否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的质疑。郭建勋<sup>[5]</sup>撰文对此加以驳斥,认定屈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文章同时对屈原爱国精神的形成进行了回顾论述。

屈原的活动范围,以前一直以为是在郢都及西楚一带,近几年有关屈原与东楚的话题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林家骊<sup>[6]</sup>考证陵阳在楚国境内的东部,与楚王同姓的人聚居于此,又根据屈原流放路线包含“南巢”等地,得出屈原到过陵阳并且在陵阳度过一段时间的结论。谭家斌<sup>[7]</sup>则对屈原放逐时的体貌特征加以考证,根据古文献、画像、塑像所透露的信息,认为屈原晚年被放逐后的体貌特征为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体态细瘦、胡须飘逸、头戴高帽、腰佩长剑、身着右衽宽袖袍服。袁正洪等<sup>[8]</sup>对报告文学《屈原:魂兮归来》一文提出质疑。刘石林<sup>[9]</sup>

收稿日期:2019-05-16

作者简介:方铭,男,甘肃庆阳人,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舒鹏,男,江西高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也对凌智民的“屈原投江湖北郢阳论”提出反对意见。

屈原的人格精神养成有其深厚文化背景,其中儒学是屈原重要的底色之一。关于屈原与儒家典籍关系,人们对屈原接受儒学的途径有种种设想,但对儒典传播至楚进而构成屈原创作的现实语境这一问题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故屈作跟传世儒典的具体关联迄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常森<sup>[10]</sup>认为,屈原接受了《书》《诗》《左氏春秋》《论》《孟》等传世儒典的巨大影响,文章中列举屈作关涉《书》《诗》的几个典例以为申说。而屈原作为楚同姓贵族身份,儒典对他的精神气质的养成和作品的写作都有显著影响。张骏<sup>[11]</sup>则对屈原作品的批判对象以及内容作出论述,认为屈原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时代和社会的批判,在内容上超越了单纯、偏狭的或政治的或道德的或社会的批判,而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批判。

屈原的影响跨越古今,今天我们的重要节假日端午节,就与屈原有密切关系。蔡靖泉<sup>[12]</sup>分析端午节源自先秦的夏至节,本以祈福禳灾为主题,以避瘟驱毒、防疫祛病等系列活动为表现形式。至东汉后期,屈原才逐渐成为端午节俗祭祀的主角,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主题,龙舟竞渡和吃粽子成为端午节俗的主要内容,同时端午节俗又因承了古老夏至节的祈禳传统,由此构成的端午节俗大概在唐代就大体定型。中国社会出版社在本年度结集出版了“2015年中国端午节俗与屈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数十篇<sup>[13]</sup>,对端午节俗文化、端午与屈原关系等进行了专题论述。

## 二、楚辞作品研究

关于“离骚”的意涵,从古至今有许多种解说,最早刘安、司马迁解为“离忧”,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刘杨<sup>[14]</sup>则从出土文献角度对《离骚》篇题的涵义进行再讨论,提出从古

文字学角度看,战国楚简文字里就已经出现用作忧愁义的“蚤”“蜚”诸形,而“又”“尤”“忧”古音相通,“蚤”“蜚”当训为“忧”。秦汉人误把“蚤”“蜚”当作表示“骚动”义的“蚤”字,以致千年聚讼。张世磊<sup>[15]</sup>则提出“离骚”首先是作为篇名存在的,因而我们首先要探究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文献篇章的命名原则及其相关文化背景,而通过对先秦文献篇题命名方式的探析,可得知《离骚》篇题的命名方式是依文本主旨内容而定的;通过对《离骚》文本进行分析可推知,“离骚”应当理解为:因是否离开(楚国)而愁苦。除了“离骚”一词,《离骚》中存在争议的字词还有不少。如屈辞提到的“彭咸”,历来有不同看法。王逸以为彭咸为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以致投水而死,并进一步认为屈原是效法彭咸而沉江,其后的《楚辞》注家多从此说。曾凡<sup>[16]</sup>认为彭咸实为巫彭、巫咸的合称,在《楚辞》中反复出现而构成一种文学意象,这种与水神相关的意象既反映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暗指他的精神归宿。常晓彬<sup>[17]</sup>从宗教神话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巫彭、巫咸、咸池、玄冥等的比较,发现“彭”“咸”是先秦时期广为人知的神祇,并且是巫者之宗主神。而“咸池、玄冥(幽冥)”,其实就是宇宙瀛海,也是灵魂的归所,同时也是彭咸所居之处。因此屈原“从彭咸之所居”沉渊而死,其实就象征着魂归玄冥这一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之流。与“彭咸”一样,有关“女嬃”的真实身份,探赜数千年来从未断绝,有屈原姊、屈原妾、屈原母、屈原保姆等多种说法。高华平等<sup>[18]</sup>认为,根据传世资料和出土文献考证,女嬃为巫的可能性很大。仝娜<sup>[19]</sup>对屈原作品中的“度”字展开讨论。孟修祥<sup>[20]</sup>对楚辞中“云梦”及“掌梦”之职加以研究,认为楚人好巫,梦占是其占卜方式之一,《招魂》所说“掌梦”即掌管圆梦之官,而非掌管云梦之官。周俊超<sup>[21]</sup>则对《离骚》中“落英”一词进行重新阐释,认为前人在“落英”一词的解释上偏

重“落”字,而忽视“英”字,实则“落”乃“英”之形容词,“落英”作“初生的苗叶”解,“英”应读作“央”。此外,王伟<sup>[22][23][24][25]</sup>认为今本《楚辞》多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他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参考和吸收前修时贤对楚辞或对其他典籍的研究成果,先后校勘整理出《楚辞》文本文句的二十二则、十五则、三十九则、二十九则。

张世磊<sup>[26]</sup>认为《离骚》是屈原有意将自己意志、情感托于女巫之口而言的诗体篇章。陈素萍<sup>[27]</sup>以《离骚》《渔父》两篇为中心,认为屈原在创作中借以女性身份出现的“美人”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渔父”构建了一个两性人物意象系统。赵娟<sup>[28]</sup>从《离骚》这一艺术作品的感性外观层和心灵旨趣层两个维度入手理解《离骚》的艺术内涵和屈原美学思想。孙华娟<sup>[29]</sup>从衣饰与求女两个角度对《离骚》意旨展开讨论,认为抒情主人公衣饰和服食对象都经历了从香草到玉的变化,其衣饰的转变最关键,对全文具有结构性的功用。王晴<sup>[30]</sup>以《离骚》中的屈原形象和《九歌》中所祭祀的神灵形象为研究重点,对楚辞中的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展开分析。陈春霖等<sup>[31]</sup>则以《离骚》为中心,对楚辞作品反映的楚国士风进行研究。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sup>[32]</sup>认为《离骚》为楚辞中性质最尖锐的一篇,表现在其时间观念中。文章认为《离骚》篇的主人翁一直怀念古老的圆环性质的时间,从太古以来人们在循环的时间里平安地生活过来,但是历史的进展使其不得不接受直线性质的新时间观念。直线性质的时间就是历史性质时间,也就是政治性质时间。主人翁处于这种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不能实现他的期望。因此,他决心离开现实世界,出发到天上游行,在天上寻找圆环性质的时间,可是他发现天上亦非从前那样的理想世界,于是他又向着天的最高处再一次出发。主人翁在天

的最高处发现的不是直线性质的时间,也不是圆环性质的时间,而是绝对性质的新的时间。这种彷徨,可以说是挣扎在战国后半时期社会变动中的楚人们寻找自己未来的精神的反映。何昶熠<sup>[33]</sup>认为屈原在选择植物时将其划分为“香草”“恶草”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准指导,而这种指导标准的产生也跟楚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屈原自身的原因存在联系。王萌芽<sup>[34]</sup>则将《离骚》与《诗经》中的植物加以对比研究,论述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

黄震云<sup>[35]</sup>对湘君、湘夫人的性别及屈原的行踪展开讨论,认为屈原作品中的湖南地名当初实际上在湖北和河南境内,屈原可能从未到过湖南。田培培<sup>[36]</sup>结合“山鬼”的性别与爱情,论证《山鬼》一诗的抒情主人公为“山鬼”自身,而“山鬼”寻求心上人实则影射屈原求君。付金<sup>[37]</sup>则将《山鬼》与杜甫《佳人》诗进行对比分析,从《山鬼》到《佳人》,体现了由神之爱恋到俗世婚姻的转变,自然意象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人文意象。李进宁<sup>[38]</sup>认为《河伯》应是以河伯族人的先祖为原型载体,在楚地风俗的基础上杂糅神话和史实而形成的祭歌,其祀主即是河伯族先祖。

关于《九歌》性质,王逸、朱熹等人认为是“祭歌”,即政治抒情诗,王国维主张“戏曲萌芽”说而否定“祭歌”说,游国恩和褚斌杰也都注意到了《九歌》的叙事性质,但仍认为《九歌》是抒情诗。周秉高<sup>[39]</sup>则认为《九歌》作品是以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为主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组记述战国后期湘西民间各种不同祭祀场面的叙事诗,而非屈原自述“冤结”之情和寄寓“讽谏”之意的抒情诗。何彦通<sup>[40]</sup>则坚持《九歌》是屈原取材于楚国南郢民间祭祀的巫歌而创作出的抒情组诗。常晓彬<sup>[41]</sup>认为《九歌》是屈原对楚国祭歌《九歌》修改加工改编而成的一组情致缥缈的祭歌,考其源流可上溯至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虞

夏时期的《九歌》。此外,唐佳女<sup>[42]</sup>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从人物塑造、意象运用和情节设置等方面分析比较《楚辞·九歌》与《圣经·雅歌》两个作品,认为此类作品在宗教性与艺术性的双重塑造下,在作者创作心理的影响下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天问》“昏微遵迹”中的“微”,一般认为即商“上甲微”。熊贤品<sup>[43]</sup>结合战国楚地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以及相关文本进行解读,认为“昏微遵迹”的记载不能作为商先公世系中存在“昏”一世的确证。刘精盛<sup>[44]</sup>提出《天问》“女何喜”之“喜”宜训释为“怀孕”。李炳海<sup>[45]</sup>则认为“吴获迄古”叙述的是吴国初创期的历史,李炳海<sup>[46]</sup>又从《天问》中的“中央共牧”四句诗解读出此以炎帝、蚩尤之战为背景,其中提到的蜂蛾指的是坚固锐利的金属兵器。炎帝、蚩尤交战的地区称为涿鹿、独鹿,鹿传说与地名存在密切关联。而“弟有噬犬”四句诗则反映晋国的宫廷内乱,叙述的是赵盾逃亡及其被以弑君恶名的经过。庞光华<sup>[47]</sup>认为“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一句中的“出”应训为“屈”或“黜”,为“黜”的假借字;“泉”本当作“渊”,唐时为避李渊讳而改为“泉”。常威<sup>[48]</sup>对《天问》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概况进行了论述,齐海英<sup>[49]</sup>认为《天问》中蕴含着合乎当代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些意识和情怀。

许富宏<sup>[50]</sup>提出《九章》多称引节士,且用来自比,可称之“节士喻”。“节士喻”是“托人言志”,多与“芳草喻”结合起来综合使用,“节士”助喻“芳草”,“芳草”也喻“节士”,两者共同成为抒情的手段,将《诗经》以来的比兴手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付利敏<sup>[51]</sup>认为《九章》可谓抒情诗的典范,与结构跌宕开合的《离骚》相比,《九章》更趋于采用一种直陈表达的艺术手法。谭家斌<sup>[52]</sup>认为《橘颂》篇是屈原任三闾大夫时管教“王族三姓”子弟的训辞。李立信<sup>[53]</sup>认为《橘颂》当是屈原二十来岁受人谗言,被怀王疏远时

的作品。李丹<sup>[54]</sup>认为《惜诵》“发愤以抒情”之“抒”取“杼”最恰当。此外,从药汀<sup>[55]</sup>作有《屈原赋辨译·九章卷》,对《九章》各篇进行了翻译和辨释。

邹旻<sup>[56]</sup>从楚地风俗与周王朝官方礼仪的区别入手,认为关于“复礼”的记载不能印证《招魂》的模式,《招魂》应是宋玉自招己魂之作,《大招》则是景差为招顷襄王魂而作。马晋等<sup>[57]</sup>则对《招魂》的招魂辞叙写方式进行分析,认为《招魂》作为招魂活动的文本化,其独特的叙写方式源于文本结构与仪式结构逻辑的内在统一,反映了战国时人鬼神信仰的文化风貌与空间性的思维习惯。朱晶晶<sup>[58]</sup>通过文献考证认为《渔父》中“鼓枻而去”之“枻”当解释为“船桨”;钟婷婷<sup>[59]</sup>对《七谏》中东方朔“代屈立言”与自荐之言加以分析;许富宏<sup>[60]</sup>认为刘向《九叹》中的“鬼谷”即指神仙化了的鬼谷子,此为文学史上首次将鬼谷子文化纳入文学创作中,并被后人继承,最终形成了以鬼谷为对象的吟咏传统。程芳萍<sup>[61]</sup>认为楚辞中神女外貌形象模糊粗粲,性格与情感平面化,而魏晋文学中神女获得了清晰具体的外貌形象,性格与情感也呈现了与作者本身脱离的倾向,完成了初步的人化。

近年来出土文献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屈原及楚辞研究领域,出土文献所起的作用也愈发重要。黄灵庚<sup>[62]</sup>提出楚辞研究必须在文献材料上有所突破,出土文献对楚辞文献的文字校勘、词义考证、屈原作品真伪的甄别、楚国典章制度及礼仪等稽钩、楚史研究的发明等重大问题均极有参考价值。但应注意在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楚辞的同时,须讲求谨慎态度和科学方法。代生<sup>[63]</sup>也认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构成的“二重证据”不能偏信一端,而应客观分析。他从清华简《楚居》篇入手,认为该篇记述了楚人的起源、发展及迁徙等情况,与楚辞有关记载也可以对读,如屈氏的来

源、楚民族名号与巫咸的关系、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或印证前辈学者的说法,或纠正以往的不足,十分重要。张树国<sup>[64]</sup>则从近年来出土的楚地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出发,对《远游》作者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百衲体”,因而被附益于《远游》之下。管仁杰<sup>[65]</sup>则结合清华简“琴舞九絃”等相关出土材料,从“诗乐舞”相配角度对《九歌》题名与篇数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屈原《九歌》之“九”实承自上古乐曲旧题,“九”表示乐曲共包含九个不同的乐章。“琴舞九絃”的结构与内容不同的乐段对应不同的主题,其歌辞与舞蹈的内容亦会对应各自主题。而《九歌》集诗、乐、舞三者于一身,按照“诗乐舞”相配的原则,包含的十一篇文章,依据祭祀对象的类别与祭祀仪程,可分为九种不同的主题,恰好能够与题名所谓乐曲“九成”相配。郭成磊<sup>[66]</sup>则以出土的楚系简帛文献为主,结合传世文献,对楚国的鬼神信仰与祭祀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鬼神崇拜、祭祀礼仪、祭祀供献进行研究。针对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的境况,周秉高<sup>[67]</sup>撰文总结,认为出土文献所具有的“补正”和“证明”作用,对于楚辞研究十分重要。

出土文献固然对存世文献的研究大有裨益,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当前与楚辞相关的出土文献其本身也存在一些争议,针对这些文献本身的研究也构成了楚辞作品研究的一部分。以1976年山东银雀山出土汉简楚辞体《唐勒》篇为例,关于其作者、文句释读等至今还有诸多争议。刘信芳<sup>[68]</sup>从文本入手,认为《唐勒》原整理报告在竹简编联上有问题,文中依据《唐勒》中御术三境界为线索对《唐勒》篇重编分章,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结论。

### 三、楚辞学史研究

刘凤泉等<sup>[69]</sup>对《屈原列传》研究论争中的“《屈原列传》为伪作”一说进行匡正,认为“伪作说”实为“屈原否定说”的旧调乱弹。文章在“维护说”基础上提出的“误字说”,为解决《屈原列传》所呈现的文献矛盾提供了思路。班固《离骚赞序》与《离骚经章句序》也是早期研究楚辞的重要文献,此二篇所反映的作者态度有明显的龃龉,《赞序》对《离骚》及屈原单纯为赞美态度,而《章句序》中则有批评,因而多被认为非同时所作。谢天鹏<sup>[70]</sup>认为《章句序》中有批评屈原的一面,也有褒扬其忠贞的一面,两篇内容并不矛盾,完全具有同时而作的可能性。此外,两汉学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讨论不绝于书,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与价值观,对屈原持有不同态度。

隋朝释道骞所著《楚辞音》对楚辞研究而言有重要文献价值,然该书在宋代散佚,后世难得一见。二十世纪初敦煌石室中发现《楚辞音》残篇,引起楚辞学者高度重视,先后有王重民、闻一多、周祖谟、姜亮夫等先生对其进行了研究。马燕鑫<sup>[71]</sup>从《楚辞音》文献价值出发,认为其对《文选》版本的校勘有参考价值,对于《离骚》而言也具有异文佐证、破除通假还原本字、辨析异文定夺是非等三方面的文献价值。由于唐时楚辞研究著作不多,学界多认为唐代是楚辞学的中落期,张宏锋<sup>[72]</sup>则认为唐人于楚辞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对《楚辞》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接受以及创造了大量的拟骚类作品,而非《楚辞》的研究专著。

传世的楚辞研究文献群星璀璨,浩如烟海,但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淹没于历史中,《楚辞释文》即是其中一种。当前关于《楚辞释文》成于何时、佚于何时、出自何人之手等问题均未有定论,赖宋邵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尤其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援引有《楚辞释文》部分内容方为后世所知,学者对此书在楚辞研究上的价值颇为重

视。周建忠等人<sup>[73]</sup>从《楚辞释文》反映的楚辞篇次与传世《楚辞章句》编次存在异议出发,探讨《楚辞·九歌》作者、《楚辞释文》作者、《释文》是否为古本、楚辞原始编次以及楚辞成书过程等重大问题,并对日本学者西村时彦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评论。

宋代洪兴祖是楚辞学史上的重要学者之一,其论著《楚辞补注》为宋元阶段的楚辞诠释代表作。刘洪波等人<sup>[74]</sup>从洪氏注楚辞文学意蕴角度分析认为《补注》除对《楚辞》章句训诂、考订异同、别白得失等方面进行辨析外,还灌注了个人对家国之感、时代之痛、经历之难的切身体会。另,刘洪波等人<sup>[75]</sup>还对洪兴祖诠释《楚辞》的心理动因加以探究。此外,刘洪波<sup>[76]</sup>关于《楚辞补注》研究有专著出版,从阐释学角度对洪兴祖阐释《楚辞》的动因、洪兴祖“补注”的阐释体式、洪氏《楚辞》阐释的“历史性”、《楚辞》三家注的阐释对比、屈洪同轨视域有效融合与屈原的境域融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除了《楚辞补注》外,朱熹《楚辞集注》也是宋代楚辞研究中的一大重要成果,邱蔚华<sup>[77]</sup>对《楚辞集注》诗学话语进行分析,孙光<sup>[78]</sup>则对朱熹解释屈原之“忠”展开论述,认为朱熹注楚辞,一方面能够从情感体验上理解屈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从现实需要出发对屈原的思想进行了部分修正和整合。宋朝除注本外,还有名物训诂作品,如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刘伟红<sup>[79]</sup>对其版本问题加以关注,以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离骚草木疏》为研究对象,整理了现存《离骚草木疏》所有版本收藏情况,并举例说明了各种版本出现的错误。

宋代楚辞学的繁盛不仅反映在楚辞类著作数量的增多和内容的广泛,还体现在其传播方面。张宏锋<sup>[80]</sup>撰文对宋代《楚辞》传播地域加以考证,全面梳理了《楚辞》在各个地域的传播情况,发现刊刻过《楚辞》的地域共有七个,约占全

国行政区的40%,而接受的主体为南方人士。这种传播现象主要是由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和当时统治者的崇儒政策造成的。楚辞研究在宋朝繁荣与当时的刻书业相关,赵聃<sup>[81]</sup>撰文对宋代《楚辞》刻书的异文保存进行研究,认为宋《楚辞》刻书不仅让《楚辞》在传播上具有了新的特点,而且对宋代楚辞学的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宋代《楚辞》刻书保存的异文研究有利于我们去探究宋代及之前《楚辞》文本的真实流存状态。

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是楚辞学史上的重要注本之一,《四库全书总目》仅评以“务为新说”“排诋诸家”,未免有失公允。赵静<sup>[82]</sup>认为从学术价值看,该书濯去旧见,创立新说;从治学方法看,融会诸家,择善而从,在明《楚辞》注本中是质量较高的一部著作。此外,赵静<sup>[83]</sup>还撰文对汪瑗的生平交友、结社、著述及汪瑗的师承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阐述。另,赵静<sup>[84]</sup>对明朝出现的《天问注补》一书的作者归属问题加以论证,认为作者不是汪瑗,应为汪仲弘。明末陆时雍作有《楚辞疏》,邓杨婷<sup>[85]</sup>认为其编写体例、注疏方法、内容主旨、文学特色等方面与其他学者有很多不同之处,为楚辞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值得学者学习与研究。薄迎迎<sup>[86][87][88]</sup>则将《楚辞疏》中的异文视作研究汉语史、楚辞训诂史的重要依据,先后撰文对《大招》《招魂》中的异文进行分类研究。此外,著名古文大家、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所作《离骚正义》关注者较少,许光<sup>[89]</sup>认为该篇以“人臣之义”为要义的思想表达与方苞对“义”的持守及其对当时社会的思考和态度是相辅相成的;该篇反映了方苞的文学审美思想,于《离骚》学史也有重要意义。

王琼<sup>[90]</sup>学位论文从楚地道家思想、楚地风俗与楚文学精神分析了王夫之《楚辞通释》不同于其他楚辞专著的特点。林云铭《楚辞灯》专解屈原和楚辞,具有简洁、精练、易懂的特点,是一

部既有入门导航之效,又有点悟启发之功的《楚辞》注本。周建忠等<sup>[91]</sup>认为林注特点在于强调屈原“忧国忧民”而跳出前人“怨君”说窠臼;对屈原的心理有细致入微、形象生动的解读;对《离骚》脉络的整体双线把握实具启发之功;灵活运用知人论世法和以意逆志法挖掘《离骚》悲剧性,突显了《离骚》永恒的文学价值。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特色鲜明,施仲贞<sup>[92]</sup>认为屈复注疏特色表现为“知人论世”“去繁就简”等,在诸家楚辞注本中独树一帜。施仲贞<sup>[93]</sup>还对《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进行了分析。谢济世的《离骚解》别具一格,施仲贞等人<sup>[94]</sup>认为谢氏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陈本礼《屈辞精义》征引自汉至清几十家治《骚》著作,收录屈原作品二十七篇,以“阐发大义”为主,从文脉、章法、大义入手,对屈辞作了详细的阐释,为清代楚辞章句派的代表作之一。周思含<sup>[95]</sup>学位论文在梳理陈本礼其人其书的基础上,从现实观、历史观和神话观等方面入手,分析陈本礼对屈辞思想内容的解读,以体现《屈辞精义》一书“阐发大义”的特色。至于刘梦鹏《屈子章句》、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等专著,学界相关研究有所不足,庄婷婷等人<sup>[96]</sup>对《屈子章句》注疏体例进行分析,认为其特色主要表现在篇章次第、注释编撰、征引典籍三方面;张琰等人<sup>[97]</sup>则对《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展开全面专题论述,认为胡濬源注疏楚辞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方式,即“求楚辞于注家”“求楚辞于史传”“求楚辞于本辞”,于楚辞研究有较大贡献。施仲贞<sup>[98]</sup>则通过考证对《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过程与著述体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清代中叶以后,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与古文经学割席分尊,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公羊学在近代的风靡,对楚辞研究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文<sup>[99][100]</sup>分析认为公羊学对楚辞

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近代楚辞研究的大家诸如王闿运、廖平,其注骚著作均可见公羊学的影子;其二是公羊学派为改制而疑古变古,形成清末民初的疑古之风,为廖平否定屈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致使“屈原否定论”在楚辞学界引起经久的震动。郭建勋等<sup>[101]</sup>曾对王闿运《楚辞释》进行研究,认为《楚辞释》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三个重要政治节点解读《楚辞》。

长久以来,晚清郭焯莹所著《读骚大例》在学术界声名不显,郭建勋等人<sup>[102]</sup>却认为郭焯莹在楚辞研究方面敢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其《读骚大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郭焯莹独特的学术见解,对楚辞学的影响不容忽视。

晚清至民国阶段,是传统楚辞研究由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发展的转型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影响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助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萌芽和发展。李金善等人<sup>[103]</sup>以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为例对晚清、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现代转型进行了研究。

李金善等人<sup>[104]</sup>通过比较游国恩所撰《屈原》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了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及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了探讨。赵然等人<sup>[105]</sup>则就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学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游国恩的楚辞学思想吸收了古代学术思想的精华,借用了中国思想史上“天道”“人事”“天算”等概念,并将其在楚辞学语境中使用,构建其楚辞学体系,阐明其学术思想。赵然<sup>[106]</sup>同时撰文对游国恩屈赋作品进行考论,提出游国恩对屈赋作品篇数的认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游国恩根据史实和作品文本详细考证了屈原作品的先后次序,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屈原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博士论文<sup>[107]</sup>即以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学为研究课题,全面回顾了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总结了其学术观点和方法,并高度评价了游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巨大价值和影响力。陈文新<sup>[108]</sup>认为,在刘永济看来,屈原之“自铸伟辞”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楚国固有文化为屈原创作“伟辞”奠定了丰厚基础;其二,屈原所铸“伟辞”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坐标。刘永济论屈原所读之书,有出于孔子删定之外者,并由此透视屈原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文化氛围,论屈赋所开创的新的抒情境界、景物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和多样化风格。廖栋梁<sup>[109]</sup>认为从梁启超到梁宗岱再到李长之,可见抒情主义的《楚辞》研究的拓深与辩证。邓盼<sup>[110]</sup>根据骆鸿凯现存《〈楚辞章句〉征引楚语考》《楚辞连语释例》《楚辞双声叠韵叠字谱》《离骚论文》等数篇文章对于其楚辞学音韵研究情况加以探究。其学位论文<sup>[111]</sup>即以骆鸿凯音韵学研究为题,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骆鸿凯《楚辞》研究中的音韵学研究;二是《声韵学》讲义所反映出来的骆鸿凯的音韵学思想。孙梦菲<sup>[112]</sup>学位论文以骆鸿凯及其《楚辞》著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搜罗骆鸿凯现存的主要著作基础上展开分析。

毛蕊<sup>[113]</sup>对饶宗颐的楚辞研究著述作出分析,认为饶宗颐利用传世文献典籍、有文字出土资料、无文字出土资料、民俗学材料以及异邦史料等材料,在楚辞篇目、地理、音乐、文献、民俗等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楚辞研究有着深刻启示和巨大影响。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出“离骚”二字有“想排脱忧愁,躲避忧愁”的意思。王人恩<sup>[114]</sup>分析认为钱钟书借鉴阐释学的理论,在疏通文字的基础上联系屈子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屈子的思想和《离骚》的实际描写,再参照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对比验证,创获甚大。姜国申<sup>[115]</sup>则对黄灵庚校本《楚辞补注》字词进行疏解,提出《离

骚》“謇謇”之本义为“险难”,王逸将“謇謇”释为“忠贞”是取其引申义。而“申申”,王逸注为“重复”,与黄疏亦不同,而二者不同乃是根源于二人对女嬃骂屈原的“亲亲之意”理解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不同,二人观点应结合起来看,不可简单判定对错。

此外,在海外影响广泛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也有对楚辞的论述,著述者为汉学家柯马丁,陈文新<sup>[116]</sup>撰文对柯氏的论述提出疑义,认为柯马丁论述有点鲁莽,其中两个主要判断是不妥当的:其一,柯马丁怀疑屈原其人的历史真实性,不免草率;其二,《九歌》与屈原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柯马丁却选择了其中根基最浅、理据极薄的一种,原因在于其对中国早期历史和传世文献抱有过多怀疑。

#### 四、宋玉及楚辞翻译研究

宋玉是屈原之后影响最大的辞赋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屈原、宋玉并称,所谓“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后世遂将二人并作中国文学之祖。关于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是楚辞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

长久以来,《笛赋》被归于宋玉名下,对宋玉作《笛赋》之真伪的争议已引发学术界的讨论。尚永亮<sup>[117]</sup>否认《笛赋》为宋玉所作,并提出相关证据认为《笛赋》当是一篇后人依据后出文献所作而托名宋玉的作品。舒鹏<sup>[118]</sup>认为《史记》评宋玉“终莫敢直谏”并无人格贬抑,而宋玉本身际遇与屈原差相仿佛,空有满腹才情,既不得君上亲任见察,又在同僚中招嫉蒙谤,“不誉之甚”;虽有拳拳之心却难申其志,进而选择“放游志乎云中”,由此形成宋玉辞赋的微讽风格。宋玉辞赋在文学疆域中有意“铺彩摛文”,开“夸饰淫丽”赋风传统。

刘刚及其团队对宋玉及其辞赋的田野调查一直在持续,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其一,对“章华台”考察。关于宋玉赋篇中“章华”所



在,从古至今众说纷纭,古之章华台故址,有城父、商水、江陵、长林、监利、华容等六种说法,刘刚等人<sup>[119][120]</sup>从实地田野调查宋赋“章华台”所指,对六个疑似地方加以考证,认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的“秦章华大夫”应为楚考烈王的属臣,而宋赋“章华”所指则仍然是楚襄王所建的河南商水之章华台。其二,刘刚等人<sup>[121]</sup>对宋玉赋中所谓“阳城”的地望进行分析,在研究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地实地调查后,认定古楚阳城当在今河南商水县境。其三,刘刚等人<sup>[122][123]</sup>对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第七份报告——宋玉宅调查报告也得出一些结论,认为宜城宋玉宅是宋玉里居,临澧宋玉宅是宋玉晚年居所,而荆州、秭归及钟祥的宋玉宅则为附会。

临澧县人大常委会<sup>[124][125]</sup>编辑出版《宋玉与临澧》《中外学者论宋玉》等有关宋玉研究论文集,前者对临澧有关宋玉的历史遗迹、传说故事、相关作品进行研究,并探讨如何保护开发与宋玉相关的历史遗存;后者则收录包括李学勤、汤漳平、朱碧莲、高秋凤等中外学者的论文三十余篇,从文学、史学、考据学等多个角度,对宋玉的生平历史、文学成就、文学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此外,第二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在本年结集出版<sup>[126]</sup>。

楚辞自诞生以来就以其独特魅力不断向国外传播。受地缘位置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朝鲜古代文人在受容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较早地接触到屈原和楚辞,他们对楚辞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朝之间文学交流的重要见证。张寒<sup>[127]</sup>对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情况加以介绍,提到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除了学习外,古代朝鲜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洪吉周即是其中佼佼者。

周建忠<sup>[128]</sup>等人即对洪氏对楚辞的受容情况进行了分析。

日本同样是深受楚辞影响的国度,楚辞很早就传播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研究楚辞认真而努力,他们不仅研究楚辞元典,还常将中国历代的《楚辞》注本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些注本加以翻译传播。林云铭所著《楚辞灯》即借由中日书籍交易之机传入日本,宽政十年以“训读本”形式得到翻刻,广为流传,成为影响日本楚辞研究较大的一种版本。孙金凤<sup>[129][130]</sup>对《楚辞灯》在日本的传播历史与相关影响进行了详致论述,其学位论文对林云铭《楚辞灯》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作了全面整体的研究,并探讨了《楚辞灯》域外传播的过程与特征,考察了中国文明域外传播的一般规律。张思齐<sup>[131]</sup>则对日本学界楚辞学研究进行分析,认为日本研究楚辞起步很早,但是日本楚辞研究的主要成就还是出现在现代阶段。其原因在于使用楚辞为材料以证明日本为神国是日本楚辞研究的内驱力,此内驱力一直存在,而且在现代益发突出,只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日本学术界的楚辞研究采取了更加学术化的表现形态。此外,日本在楚辞文献保留上也值得重视。李佳玉<sup>[132]</sup>指出以往国内对于日本楚辞文献的研究,数量较少,研究方法集中在对近现代日本汉学界楚辞研究状况的概述上,缺乏对于日本楚辞文献版本的细致把握。李氏从日本图书馆馆藏入手,采用多样化的调查与研究方法,发现并试图解决日本楚辞文献版本的收录问题,从而形成对日本楚辞文献的系统介绍。

近代以来,英译楚辞蔚为大观,以英文为载体的楚辞成为楚辞海外传播的大宗。楚辞英译的发展及翻译研究也逐渐成为楚辞研究热点所在,研究角度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就楚辞英译本身而言,相关的理论和具体翻译细节谈论者众多。尹丕安等<sup>[133]</sup>即以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

论对楚辞的神话意象翻译进行了分析研究。邓超群等<sup>[134]</sup>则从源语文化视域下对宋玉《神女赋》王、玉二字英译问题进行了研究。樊琳<sup>[135]</sup>学位论文以屈赋主要英译本中“兮”字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对屈赋主要英译本中“兮”字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以期寻找合适的翻译策略来展现屈赋中的“兮”字。章石<sup>[136]</sup>学位论文则以《楚辞》为例引用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研究,其研究颇具新意。

以楚辞翻译著称的中外学者有杨宪益、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理雅各、霍克思、韦利等诸位大家,他们的翻译为楚辞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他们翻译成果的研究也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如严晓江<sup>[137]</sup>对国内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等四种楚辞英译本进行了析评。严晓江<sup>[138]</sup>还撰文对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阿瑟·韦利译注《九歌》的特色进行了研究。陈笑芳<sup>[139]</sup>则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韦利对《离骚》的译介功绩及其译文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其翻译的《大招》为例,指出其译文中存在误读误译、删略漏译及随意增衍三大问题。在英译楚辞中,《离骚》一篇的英译本有多种,最能代表英译者的翻译特色。彭家海<sup>[140]</sup>、李静茹<sup>[141]</sup>、张婷<sup>[142]</sup>、陈笑芳<sup>[143]</sup>、赵红辉<sup>[144]</sup>等人撰文对理雅各、杨宪益、许渊冲、霍克思、许渊冲、卓振英等英译《离骚》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了各大译本的翻译特点和不足。

除翻译传播视角之外,本年度的楚辞研究还涉及音韵、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

本年度楚辞研究还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专著。常森<sup>[145]</sup>《屈原及楚辞学论考》一书着意于揭示屈辞之现实触媒,澄清学术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力图从根本上彰显真实而鲜为人知的“历史的屈原”,并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给出富有实证性的诠释。书中借助个案研究,揭明屈子精

神及其艺术特质,论析《远游》在思想、文化、文学史视野中的独特性,破解它所勾连的一系列重要史实。此书继其前作《屈原及其诗歌研究》之后,在新的论域进一步书写了屈原在中国历史及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各专门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杨义<sup>[146]</sup>论著《屈子楚辞还原》多层次地展示了屈原与《楚辞》完整的立体的风貌,以引导人们深入体悟屈原与《楚辞》精湛的文化生命内涵。台湾学者鲁瑞菁<sup>[147]</sup>《楚辞骚心论》从屈赋文本入手,主要探讨屈原在文本写作中的个人志向、情思,以及他所运用的种种文学表现手法等。熊良智<sup>[148]</sup>的论著则对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进行研究。李川<sup>[149]</sup>则立足于对神话学理论的反思,并吸收古典著述传统、西方古典学以及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对《楚辞·天问》与西方《神谱》两诗进行了平行比较研究。汤洪<sup>[150]</sup>《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一书对屈辞所涉昆仑、流沙、赤水、不周、西海、崦嵫、西极、冬暖之所、夏寒之所、黑水、三危等重要古地名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辨证。此外,路百占<sup>[151]</sup>《路梅村遗稿》下册收入《楚辞发微》四卷、《屈原列传发微》、《屈原历史论文集》等,此为路氏楚辞研究最新成果的荟萃。

另,2016年由中国楚辞学会<sup>[152][153]</sup>所编的《中国楚辞学》第二十三辑、第二十四辑先后出版,收录了大量海内外知名学者楚辞研究相关论文,是楚辞学界重要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

#### 参考文献:

- [1]张强.屈原爱国主义情感与楚人的忠君爱国传统[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52-57.
- [2]潘冬.屈原爱国主义教育探析[J].兰台世界,2016(14):94-96.
- [3]陈亮.屈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始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06.
- [4]钱耐香.卓世才华横溢人格魅力无穷——论屈原之奇[J].新余学院学报,2016(2):71-75.
- [5]郭建勋.屈原的乡国之情与人格魅力[J].湘潮,2016(7):

- 13-17.
- [6] 林家骊. 屈原与东楚关系新证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8-29.
- [7] 谭家斌. 关于屈原体貌特征的文献考察[J]. 云梦学刊, 2016(1): 44-48.
- [8] 袁正洪, 邢方贵, 王永国, 胡继南. 屈原会在秦国汉水鄢阳投江吗? ——报告文学《屈原: 魂兮归来》质疑之一[J]. 职大学报, 2016(5): 32-39.
- [9] 刘石林. 屈原投汨罗辩——再评凌智民先生屈原投江湖北鄢阳论[J]. 职大学报, 2016(1): 9-14.
- [10] 常森. 屈原与传世儒典之关联[J]. 社会科学文摘, 2016(1): 109-110.
- [11] 张骏. 试论屈原的大众文化批判[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136-141.
- [12] 蔡靖泉. 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与文化意义[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1): 115-124.
- [13] 罗杨. 端午与屈原——中国端午节俗与屈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6.
- [14] 刘杨. 从出土文献看《离骚》篇题解[J]. 殷都学刊, 2016(2): 52-55.
- [15] 张世磊. 从先秦文献命名方式看《离骚》篇题及其内涵[J]. 唐都学刊, 2016(2): 67-73.
- [16] 曾凡. 楚辞“彭咸”考辨[J]. 殷都学刊, 2016(4): 53-58.
- [17] 常晓彬. 屈赋中的“彭咸之谜”[J]. 昭通学院学报, 2016(4): 87-92.
- [18] 高华平, 李璇. 女嬃为巫新考[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100-105.
- [19] 仝娜. 楚辞之“度”研究[J]. 鸡西大学学报, 2016(2): 117-119.
- [20] 孟修祥. 屈原与云梦、“掌梦”之职辨[J].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5): 24-26.
- [21] 周俊超. 《离骚》“落英”新解[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6(7): 30-31.
- [22] 王伟. 《离骚》校证(二十二则)[J]. 贵州大学学报, 2016(3): 171-175.
- [23] 王伟. 《楚辞》校证(十五则)[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76-80.
- [24] 王伟. 《楚辞》所载汉人作品校证(三十九则)[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1-6.
- [25] 王伟. 《九歌》《九辩》校证(二十九则)[J].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4): 51-56.
- [26] 张世磊. 《离骚》: 托之巫口的托言体诗[J]. 文学评论, 2016(6): 82-85.
- [27] 陈素萍. 论屈原作品中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的建构及其成因——以《离骚》与《渔父》为代表[J]. 安徽文学, 2016(9): 21-23.
- [28] 赵娟. 屈原之美——浅谈《离骚》的美学结构[J]. 美与时代, 2016(6): 25-27.
- [29] 孙华娟. 服饰与“求女”: 《离骚》新探[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 160-164.
- [30] 王晴. 从《楚辞》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南北文化的交融——以《离骚》《九歌》为例 [J]. 黑河学院学报, 2016(6): 197-199.
- [31] 陈春霖, 祁国宏. 从“楚辞”看战国时期楚国的土风——以《离骚》为中心[J]. 名作欣赏, 2016(26): 130-132.
- [32] [日]小南一郎. 《楚辞》的时间观念[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72-79.
- [33] 何昶熠. 浅谈《离骚》中的草木世界[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8): 106-107.
- [34] 王萌芽. 《诗经》与《楚辞》植物对比研究——以《离骚》为例[J]. 名作欣赏, 2016(3): 24-25.
- [35] 黄震云. 《湘君》《湘夫人》性别的识别和屈原的行踪[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77-81.
- [36] 田培培. 《九歌·山鬼》中“山鬼”之新考[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6(5): 79-86.
- [37] 付金, 姜金元. 神、鬼、人: 爱的高扬与爱的退场——屈原《九歌·山鬼》与杜甫《佳人》的对比分析[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7): 19-23.
- [38] 李进宁. 屈原《河伯》祀主探源[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6(1): 92-102.
- [39] 周秉高. 论《楚辞·九歌》是叙事诗而非抒情诗[J]. 云梦学刊, 2016(3): 38-43.
- [40] 何彦通. 论屈原《九歌》的民俗特色——答《九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J]. 关东学刊, 2016(3): 83-88.
- [41] 常晓彬. “人、神”之恋”的祭歌——《九歌》[J]. 昭通学院学报, 2016(3): 33-39.
- [42] 唐佳女. 情爱与信仰的交融——《楚辞·九歌》与《圣经·雅歌》之比较阅读[J]. 镇江高专学报, 2016(1): 18-25.
- [43] 熊贤品. 《楚辞·天问》“昏微遵迹”与商先公世系问题[J]. 殷都学刊, 2016(3): 16-20.
- [44] 刘精盛. 屈原《天问》岂是质问简狄为什么高兴? ——“女何喜”之“喜”宜训释为“怀孕”[J]. 邯郸学院学报, 2016(1): 84-85.
- [45] 李炳海. 《天问》对吴国初创期的历史叙事及价值[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118-125.
- [46] 李炳海. 《天问》叙事与炎帝、蚩尤之战及晋国内乱[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1-9.
- [47] 光华. 《楚辞·天问》“汤出重泉, 夫何罪尤”新解[J]. 中国文字研究, 2016(2): 168-172.
- [48] 常威. 民国《天问》研究平议[J]. 云梦学刊, 2016(4): 30-37.

- [49]齐海英.生态文明意识的非自觉在场——屈原《天问》的新视角解读[J].理论月刊,2016(12):76-80.
- [50]许富宏.《楚辞·九章》中的“节士喻”及其文学渊源[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68.
- [51]付利敏.灵魂的交响乐——论《九章》诗学艺术二题[J].名作欣赏,2016(11):174-176.
- [52]谭家斌.《橘颂》是屈原管教“王族三姓”子弟的训辞[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8-10.
- [53]李立信.《橘颂》写作年代估测[J].职大学报,2016(5):25-28.
- [54]李丹.《九章·惜诵》“发愤抒情”解[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6(2):20-29.
- [55]从药汀.屈原赋辨译·九章卷[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
- [56]邹旻.论《大招》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的对象[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1-74.
- [57]马晋,祁国宏.《招魂》篇招魂辞叙写方式研究[J].名作欣赏,2016(26):63-65.
- [58]朱晶晶.论《渔父》中“鼓枻而去”的“枻”[J].语文学刊,2016(9):62,103.
- [59]钟婷婷.《七谏》平民文人东方朔的“自荐书”[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6(3):27-30.
- [60]许富宏.《楚辞·九叹》“鬼谷”及其与吟咏鬼谷子传统的形成[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6(1):29-37.
- [61]程芳萍.从楚辞到魏晋文学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神女形象的第一次嬗变[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8):7-9.
- [62]黄灵庚.出土文献与当下的《楚辞》研究[J].云梦学刊,2016(3):44-46.
- [63]代生.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14.
- [64]张树国.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3-71.
- [65]管仁杰.从“诗乐舞”相配角度谈《九歌》题名与篇数问题——结合“琴舞九絃”等相关出土材料[J].云梦学刊,2016(6):28-33.
- [66]郭成.楚国神灵信仰与祭祀若干问题考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6.
- [67]周秉高.也谈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J].职大学报,2016(5):21-24.
- [68]刘信芳.汉简《唐勒》重编分章考释[J].江汉考古,2016(6):110-115.
- [69]刘凤泉.孙爱玲也论《屈原列传》疑案(下)——《屈原列传》研究论争述论[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1-4.
- [70]谢天鹏.班固《离骚经章句序》与《离骚赞序》不能并时而作辨[J].云梦学刊,2016(5):41-46.
- [71]马燕鑫.道骛《楚辞音》对《文选》版本的校勘价值——以《离骚》经及王逸注为例[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6):7-10.
- [72]张宏锋.唐代《楚辞》接受新见[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5):60-63.
- [73]周建忠,倪歌.《释文》的纠结与《楚辞》的篇次[J].职大学报,2016(5):12-20.
- [74]刘洪波,张桂琴.洪兴祖《楚辞》诠释的文学意蕴[J].湖南社会科学,2016(2):186-189.
- [75]刘洪波,张桂琴.洪兴祖诠释《楚辞》的心理动因[J].云梦学刊,2016(9):47-51.
- [76]刘洪波.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77]邱蔚华.朱熹《楚辞集注》诗学话语发微[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7-77.
- [78]孙光.朱熹释屈原之“忠”[N].光明日报,2016-06-24.
- [79]刘伟红.《离骚草木疏》述略[J].图书馆学刊,2016(2):119-121.
- [80]张宏锋.宋代《楚辞》传播地域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148-150,153.
- [81]赵聃.对宋代《楚辞》刻书的异文保存[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40-143.
- [82]赵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集解》评介辨正[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8):74-78.
- [83]赵静.汪瑗的生平及著述[J].图书馆学研究,2016(9):98-101,89.
- [84]赵静.《天问注补》作者疑误辨[J].文献,2016(4):170-173.
- [85]邓杨婷.《楚辞疏》评介[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4):37-38.
- [86]薄迎迎.《楚辞疏·大招》异文研究[J].语文学刊,2016(11):66,102.
- [87]薄迎迎.《楚辞疏·大招》通假字异文研究[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11):110-111.
- [88]薄迎迎.《楚辞疏·招魂》异文研究[J].语文学刊,2016(12):59,107.
- [89]许光.《离骚正义》与望溪“义法”[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69-74.
- [90]王琮.楚文化视阈下的《楚辞通释》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6.
- [91]周建忠,孙金凤.论林云铭《楚辞灯》对《离骚》的解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30-38.
- [92]施仲贞.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0-75.
- [93]施仲贞.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J].南通大学学

- 报(社会科学版),2016(1):69-75.
- [94]施仲贞,张琰.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129-133.
- [95]周思含.陈本礼《屈辞精义》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 [96]庄婷婷,施仲贞.论刘梦鹏《屈子章句》之注疏体例[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8-25.
- [97]张琰,施仲贞.论《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117-123.
- [98]施仲贞.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与体例[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123-127.
- [99]李文.公羊学与楚辞研究[J].天中学刊,2016(2):94-98.
- [100]李文.近代公羊学与屈原否定论[J].职大学报,2016(1):28-31.
- [101]郭建勋,罗璐.论王闾运《楚辞释》的政治化阐释及其影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48-154.
- [102]郭建勋,陈聪灵.论郭焯莹《读骚大例》的研究方法[J].云梦学刊,2016(2):23-27.
- [103]李金善,赵然.晚清、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闾运、梁启超、游国恩为例[J].河北学刊,2016(2):114-118.
- [104]李金善,赵然.游国恩的屈原研究及学术史意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4-19.
- [105]赵然,李金善.游国恩楚辞学思想探源[J].人民论坛,2016(8):187-189.
- [106]赵然.游国恩屈赋作品进行考论[J].保定学院学报,2016(3):90-98.
- [107]赵然.游国恩楚辞学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6.
- [108]陈文新.刘永济论屈原之“自铸伟辞”[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6):137-144.
- [109]廖栋梁.抒情主义与现代《楚辞》研究——梁启超、梁宗岱与李长之[N].人文中国学报,2016-05-13.
- [110]邓盼.骆鸿凯《楚辞》学中的音韵研究探赜[J].云梦学刊,2016(2):28-32.
- [111]邓盼.骆鸿凯音韵学研究探赜[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
- [112]孙梦菲.骆鸿凯与《楚辞》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6.
- [113]毛蕊.饶宗颐的《楚辞》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10):66-70.
- [114]王人恩.论钱钟书对《离骚》题义的破解[J].兰州学刊,2016(10):53-58.
- [115]姜国申.黄灵庚校本《楚辞补注》字词疏解札记[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6(2):14-19.
- [116]陈文新.疑古与分寸——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楚辞论述[J].文艺研究,2016(6):153-160.
- [117]尚永亮.《笛赋》伪作性质的几点思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55-158.
- [118]舒鹏.宋玉辞赋“微讽”之风考辨[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6(6):13-17.
- [119]刘刚,吴龙宪,蒋梦婷.宋赋“章华台”所指综合田野调查报告(上)[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4):32-39.
- [120]刘刚,吴龙宪,蒋梦婷.宋赋“章华台”所指综合田野调查报告(下)[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6):26-32.
- [121]刘刚,王梦.宋玉赋“阳城”地望研究[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10):23-28.
- [122]刘刚,关杰,王梦.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七上)——宋玉宅调查报告[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1):27-32.
- [123]刘刚,关杰,王梦.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七上)——宋玉宅调查报告[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3):21-28.
- [124]临澧县人大常委会.宋玉与临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
- [125]临澧县人大常委会.中外学者论宋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
- [126]李骛.第二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宋玉及其辞赋研究[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 [127]张寒.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5):116-121.
- [128]周建忠,贾捷,陈慧.洪吉周对《楚辞》的受容研究[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6(1):120-130.
- [129]孙金凤.林云铭《楚辞灯》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44-149.
- [130]李金凤.林云铭《楚辞灯》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D].南通:南通大学,2016.
- [131]张思齐.日本楚辞学的内驱力[J].大连大学学报,2016(1):30-42.
- [132]李佳玉.日本楚辞文献版本的调查与研究[J].职大学报,2016(1):22-27.
- [133]尹丕安,师丹萍.帕尔默文化语言视角下《楚辞》的神话意象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5):103-106.
- [134]邓超群,翟新明.源语文化视域下宋玉《神女赋》王、玉之辨的英译研究[J].职大学报,2016(2):525-529.
- [135]樊琳.屈赋主要英译本中“兮”字的策略比较[D].武汉:湖北工业大学,2016.
- [136]章石.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翻译主体间性研究——以《楚辞》为例[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6.

- [137]严晓江.国内四种《楚辞》英译本析评[J].语言与翻译, 2016(4):79-83.
- [138]严晓江.阿瑟·韦利的《九歌》译介特色[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9-19.
- [139]陈笑芳.韦利与《楚辞》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J].蚌埠学院学报,2016(4):111-115.
- [140]彭家海,樊琳.《离骚》两个英译本的文学特征比较分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6(3):89-93.
- [141]李静茹.论《离骚》的翻译及其文化比较[D].海口:海南大学,2016.
- [142]张婷.《楚辞》英译文之概念功能分析——以《离骚》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66-170.
- [143]陈笑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与《离骚》英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1-64.
- [144]赵红辉.互文性视阈下《离骚》的英译对比研究[J].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2016(5):49-52.
- [145]常森.屈原及楚辞学论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46]杨义.屈子楚辞还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147]鲁瑞菁.楚辞骚心论——讽谏抒情与神话仪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 [148]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49]李川.论“谱属诗”——《天问》《神谱》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150]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 2016.
- [151]路百占.路梅村遗稿:下[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 [152]中国楚辞学会.中国楚辞学:第23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 [153]中国楚辞学会.中国楚辞学:第24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李有梁]

## Research Review of Qu Yuan and Chu Ci in 2016

FANG Ming SHU Peng

- (1. Institute of Confuciu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Qu Yuan and Chu Ci (*The Songs of the South*)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material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In 2016, related research continued making progress and numerous studies were published. In collaborate with various fields, such as the Qu Yuan Study, the Chu Ci Study, the Study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u Ci, the Study of Song Yu,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u Ci.

**Key words:** Qu Yuan; Chu Ci; academic history of Chu Ci; Song Yu